

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建构

文学与认同

蒙元西游、北游文学与蒙元王朝认同建构研究

◎刘扬忠 蒋寅主编 ◎王筱芸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建构

文学与认同

蒙元西游、北游文学与蒙元王朝认同建构研究

◎刘扬忠 蒋寅主编 ◎王筱芸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与认同:蒙元西游、北游文学与蒙元王朝认同建构研究 /王筱芸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12(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建构 /刘扬忠,蒋寅主编)

ISBN 978-7-5545-1566-2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蒙古族—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元代 IV. ①I207.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1263号

- 丛 书 名 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建构
丛书主编 刘扬忠 蒋寅
书 名 文学与认同:蒙元西游、北游文学与蒙元王朝认同建构研究
作 者 王筱芸
策 划 张晨光
责任编辑 姬璐璐
封面设计 牛亚勋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050061)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40千字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5-1566-2
定 价 48.00元

目 录

导论：华夏民族认同精神史进程中的蒙元王朝认同建构 /001

第一节 华夏民族认同精神史与认同建构模式简述 /003

- 一 “华夷之辨”与“用夏变夷”是先秦以来华夏民族认同建构的重要模式，并由此形成“华夏中心”、“华夏正统”的民族认同和文化价值取向 /005
- 二 “华夷同源共祖”多族大一统认同，是秦汉“大一统”背景下华夏民族认同建构的新模式 /010
- 三 “华夷之辨”差异性认同和“华夷同源共祖”同一性认同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民族统治王朝的认同建构特征及其对华夏民族认同精神史进程的影响 /014

第二节 华夏民族认同精神史进程中的蒙元王朝和蒙元王朝认同 /031

- 一 大蒙古国从部落到游牧国家的崛起与族群文化、王朝制度特征 /031
- 二 从大蒙古国到元王朝：从草原中心到汉地中心的重大转折和折中蒙汉制度“诸制并举”的多元制度特征 /036
- 三 多族多文化冲突语境中的蒙元王朝认同建构对华夏民族认同精神史进程的开放多元影响 /045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073

一 历代蒙元史和王朝认同研究概述 /073

二 本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088

第一章 蒙金之交西游文学与大蒙古国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王朝认同建构 /094

第一节 蒙金之交西游士人与西游文学代表人物 /094

一 原金朝士人西游的历史环境 /095

二 西游士人的西游目的、西游路线和活动 /104

第二节 西游文学的蒙古王朝认同建构、作用和意义 /119

一 西游纪行诗与西游士人的漠北西域地域、族群认同建构 /120

二 新西域诗将蒙古王朝作为新主体、新意象建构的肯定性审美价值和蒙古王朝认同 /130

三 西域寓居诗与西游士人的自我期待和王朝认同在大蒙古国漠北草原中心时期的冲突与挫败 /138

四 西游文学的蒙古王朝认同建构作用和意义 /143

第二章 蒙元之交金莲川幕府士人文学的元王朝认同建构 /147

第一节 蒙元之交金莲川幕府群体形成与辅佐忽必烈建立元朝的作用和意义 /148

一 金莲川幕府群体形成的历史环境与代表人物 /148

二 金莲川幕府群体辅佐忽必烈治汉地建元朝的作用和意义 /156

第二节 金莲川幕府汉儒群体的论政文学与元朝认同建构 /165

一 强调汉法治国的策论和以汉法为中心的制度建设与王朝认同建构 /165

二 以汉制为中心的元朝立国建制诏书与元朝制度建设和认同

建构 /170

三 建构华夷皆可为正统的北方民族认同和元朝正统认同 /173

第三节 金莲川幕府士人开创的上都文学元朝认同建构与上都扈从文学传统 /179

一 从金莲川幕府士人北游纪行到元朝文人两都扈从纪行体现的蒙元王朝认同建构过程 /179

二 金莲川幕府士人开创的上都文学元朝认同建构与上都扈从文学传统 /191

三 元朝两都巡幸扈从文学对金莲川幕府上都文学母题和王朝认同建构传统的发展 /205

第三章 元朝南方士人北游文学的王朝认同变迁与元朝认同建构 /219

第一节 元朝南方士人北游的历史环境和王朝认同语境变迁 /220

一 宋亡后元朝南方士人北游的历史环境 /220

二 从“内中国而外夷狄”到“内北人而外中国”的认同传统颠覆和认同语境变迁 /223

第二节 宋亡后南宋皇室北虏元都的亡国诗史和抗元英雄的爱国绝响 /233

一 宋亡之初南宋皇室北虏元都的亡国诗史和故国之哀 /234

二 宋亡后以文天祥为代表的抗元英雄北上元都的爱国绝响 /255

第三节 元初南北统一南方士人北游文学的王朝认同变迁和认同重构 /266

一 元朝南北统一之初南方士人的群体分化和出处选择态度 /266

二 遗民、贰臣与新仕——南方士人出处选择三种类型及其北

游文学的王朝认同变迁与元朝认同重构 /268

第四节 元朝中后期北游南方士人馆阁文学群体的大都叙述和应制文学的元朝认同建构 /298

- 一 元朝中后期南方士人群体出仕态度和舆论转变以及元朝文治中兴的历史变化特征 /299
- 二 元朝中期大德年间北游南方士人的大都叙述与元王朝大一统认同建构 /307
- 三 元朝中后期北游南方士人馆阁文学群体应制文学的元朝认同建构 /312

结语 /336

导论：华夏民族认同精神史进程中的蒙元王朝认同建构

同建构

蒙元王朝是第一个在华夏中国实现大一统的北方边疆民族王朝。从1211年成吉思汗攻金开始，前后半个多世纪，蒙古王朝三次西征、灭国四十；先后灭夏、灭金、平宋，最终统一中国。创建了“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①的亘古未有的庞大帝国。

明初修《元史》，自成吉思汗建国到元顺帝出亡（1206—1368），通称元朝，计一百六十二年。虽然元朝建国号“大元”是在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年），到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总共只有九十七年历史，然而元朝史与大蒙古国史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学术界通常将元史分为四个阶段：1206年至1259年为第一阶段，1206年，成吉思汗建大蒙古国于漠北，经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由、宪宗蒙哥朝，史称大蒙古国前四汗时期。1260年至1294年为第二阶段，从1260年忽必烈即位于汉地到他逝世，史称忽必烈时期。1295年至1332年为第三阶段，包括元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诸朝，史称元代中期。1333年至1368年顺帝朝为第四阶段，史称元代末期。^②第一阶段统称大蒙古国，从第二阶段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至1368年元亡，史称元朝。第一阶段蒙古王朝以漠北草原为中心，以黄金氏族和游牧国家分封投下方式统辖亚欧庞大帝国，华夏中国北方汉地只是大蒙古国的一部分。第二阶段以汉地为中心，忽必烈及其后裔兼中国皇帝与蒙古大汗于一身。元王朝与蒙古其他四大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处于松散藩属状态。

① [明]宋濂《元史》卷五八《地理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45页。

② 白寿彝、陈得芝《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200页。

蒙古王朝攻伐尚武,^①“宗室分封、家臣治国”的分封投下游牧国家制度,^②与华夏王朝崇尚儒术文治的汉法相异;元朝“内北方外中国”的北方边疆民族中心,^③与“内诸夏而外夷狄”^④、“不与夷狄之主中国”^⑤的中原中心华夏正统相悖。元朝统一中国,虽然采行汉法,但许多维系蒙古贵族利益的蒙古旧制依然同时并行。元朝实行“因俗而治”与“诸制并举”的二元或多元政策,^⑥同中许异,异中求同;不强求“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多制、多语、多族并行的元朝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历史现实,^⑦形成以北方民族为中心的多族大一统认同模式。使传统以汉族和汉族王朝为中心的大一统认同模式,面临认同解构和冲突。^⑧使蒙元时期以儒家文化传承为己任的士人群体,面临王朝认同和族群认同冲突变迁和认同重构的重大问题。

金元和宋元西游、北游士人群体,指从蒙金之交、金中都被蒙古人攻破、金王朝被迫南迁后留在北方汉地的原金朝士人,蒙元之交特别是金亡后从中原返回北方的原金朝士人群体,以及宋元之交、元朝统一南北后北游的南方士人群体。他们或先后奔赴大蒙古国所在的漠北,追随西征的成吉思汗西游,或追随潜邸时期的忽必烈北游、南征。从燕京到漠北、西域,从汉地到哈喇和林,从哈喇和林到开平新都,再从开平上都到元大都,从南方到元大都和元上都。他们前赴后继、孜孜不倦地上书献策,希望蒙古贵族统治者应用汉法,尊崇儒教礼乐文化。为推动蒙元政权从草原中心向汉地中心的历史性转折做出最大努力。尽管从大蒙古国到元朝,即使是在号称最重用儒士的元朝初期,蒙元统治者也只是“附会汉法”,始终没有像历代华夏王朝那样,独尊

① [元] 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进,不异左乎。”见[元]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附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24页。

② 张帆《元朝的特性——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期,第445页。

③ [明]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5页。

④ 《左传·成公十五年》,见[清] 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97页。

⑤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见[清] 阮元《十三经注疏》,同上,第2327页。

⑥ 白钢《关于忽必烈“附会汉法”的历史考察》,《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第93~107页。

⑦ 萧启庆《元朝的统一和统合:以汉地、江南为中心》,《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1页。

⑧ [元] 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家承大乱之后,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所谓更造夫妇肇有父子者,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诸国之人,言语之不通,趣向之不同。”见[元]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附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4页。

儒术和汉制。但是蒙元、宋元士人群体仍然在历史给定的特殊条件下，借助华夏大一统的认同资源，重构了一套既适应元王朝多族、多制特性，但又是以华夏民族认同精神史模式为主干的、以北方民族为中心的多族大一统王朝认同模式。以此确立元王朝在中国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并由此确立蒙元、宋元士人群体安身立命的身份意识和历史文化取向。

从表面上看，蒙元、宋元士人群体运用的多族大一统蒙元王朝认同建构方法，同历代王朝以及与其同时期对峙的金源、赵宋王朝认同建构一样，都是汉文化“天命论”“大一统”、“用夏变夷”的传统资源和核心价值。实质上，他们已经将汉唐以来的汉族中心多族大一统认同向北方民族中心多族大一统认同开放转型。形成与传统华夏中心认同不同的、以北方民族为中心的多族大一统认同模式。这种以北方民族为中心的多族大一统认同模式，除了使传统华夏汉族中心认同遭遇巨大冲击、为蒙古中心多族等级制度形成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寻找合法性的权力话语共谋之外，如果从更开阔的历史视野和历史发展着眼，它还以北方民族中心多族、多制、多文化认同的兼容视野，为以汉族为中心的华夏民族传统认同模式，提供了新的王朝认同模式和新的认同经验。形成对华夏民族认同精神史进程的开放多元兼容拓展，成为当代中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① 华夏民族认同建构的远源，在华夏民族认同精神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解蒙元时期以北方边疆民族为中心的多族大一统王朝认同和民族认同在华夏民族认同精神史进程上的作用和意义，我们有必要对华夏民族认同精神史和认同建构模式做一个简要的回顾。

第一节 华夏民族认同精神史与认同建构模式简述

华夏民族^②，或称中华民族，“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人民。它所包括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③。“多民族”，在华夏民族形成与中国疆域发展的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具体所指。今天是指我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代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②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代序，同上，第117页。

③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代序，同上，第3页。

国目前的五十六个民族，在历史上则一般分为两个大的类别，即夏（或华）和夷。夏，是指在中原地区形成的华夏族及由其发展而来的汉族；夷，则用来指称华夏族或汉族之外的其他众多民族。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华夏民族这样巨大的族群，无疑有着多歧的族群来源与迥异的骨肉血脉。^① 从先秦时代起，华夏民族集团称自己人们共同体为诸夏，称本民族集团之外的其他民族集团为夷狄戎蛮（或总称为夷），把华夏民族集团与其他夷狄戎蛮族群的区别称为华夷之辨或华夷之别。^②

“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所以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③ 费孝通把民族认同意识作为民族群体的心理特征，^④ 认为：“民族认同意识，就是指我们把周围所接触到的各种人一分为二，一是自家人（我者），一是陌生人（他者）。简单说是把人己（我者和他者）之别用来区别不同的群体。而且用不同的感情和态度来对待这两种群体。凡是和自己同属一个群体的，即是自家人，相互之间痛痒相关，休戚与共。自家人的认同意识就发生了共同的命运感和共同的荣辱感。”^⑤ 陌生人认同，也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⑥ 的差异性判断。“自家人”的群体认同，通常被称为同一性认同，“陌生人”的区别认同，被称为差异性认同。数千年来华夏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差异性冲突与同一性认同如影随形。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到自为、自觉地辨认华夏与其他族群的差别并且进行华夷一体的同一性认同建构，构成华夏民族认同精神史和认同建构史。^⑦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代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② 最早提出“华”、“夷”之别的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齐桓公，他们认为“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86页。

③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代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④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代序，同上，第16页。

⑤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代序，同上，第9页。

⑥ 《左传·成公四年》，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01页。

⑦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译者序：“现代西方民族学现代主义论最杰出的贡献，被认为在于其发现——族群或民族具有人为地从主观上加以构建的属性。认同是在与他者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产生的。没有他者，也就没有认同。认同建构是一个充满张力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共时与历时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场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一 “华夷之辨”与“用夏变夷”是先秦以来华夏民族认同建构的重要模式，并由此形成“华夏中心”、“华夏正统”的民族认同和文化价值取向

认同缘于差异，有差异才会有认同。“华夷之辨”^①的差异性辨识，与“用夏变夷”^②的“华夏中心”认同模式，是华夏民族认同和认同建构的重要方式。聚居于中原的诸夏之民，对于自身与其他居于华夏边缘的族群差异之分辨，在中国古代称为“华夷之辨”和“华夷大妨”。他们主张通过“用夏变夷”将“夷狄”族群改造为应用华夏之礼的“化内之民”^③的认同过程，称为认同建构。所谓“用夏变夷”，就是夷狄族群或夷狄王朝认同并且应用周王朝建立的礼乐文化和等级次序，从而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并令人信服的过程。

“华夷之辨”“用夏变夷”的“华夏中心”认同模式，出现在春秋时期。春秋时期齐、鲁、晋、郑等为周天子所封、奉行周礼的中原诸侯国，以其在四夷之中，故自称中国、中华、华夏，也即“王者必居天下之中”^④，“惠此中国，以绥四方”^⑤。不奉行周礼的方国与位于中原外缘的秦、楚、吴、越、燕等国，则被称或自称为“夷狄”，如楚国自称“我蛮夷也。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⑥

最早提出“华夷之辨”的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齐桓公，他们认为，“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⑦“‘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我族，其字我乎。”^⑧此时的“华夷之辨”，主要从居住地域和是

① 《左传·闵公元年》，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86页。

② 《孟子·滕文公上》，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同上，第2706页。

③ 《礼记·学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同上，第1521页。

④ 梁启雄《荀子简释·大略》：“欲近四方。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5页。

⑤ 《诗·大雅·生民》，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48页。

⑥ 〔汉〕司马迁《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95页。

⑦ 《左传·闵公元年》，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86页。

⑧ 《左传·成公四年》，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同上，第1901页。

否奉行“周礼”——也即文化上分辨、界定华夏族群和夷狄族群的区别。“华”指居住在中心、奉行周礼的华夏族群，代表文明与中心化。“夷”是指奉行夷礼而非周礼、居住在中国四边的蛮夷戎狄，代表落后与边缘化。儒家创始人孔子对管、齐的“华夷之辨”很赞许，认为假如没有他们通过“华夷之辨”来号召“尊王攘夷”，以周礼为标志的华夏族群和文化将被夷狄化。“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①并且在管、齐提出的“华夷之辨”基础上，直接提出“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礼别华夷”的“夷夏大防”^②。

华夷族群差别，实际上包括族（血）缘、地缘与生活方式、文化礼仪制度等多方面的差异分辨：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③

这里概括的不可推移之“性”（血缘）和所处的“五方”不同的地域，以及因为“语言”、“嗜欲”不同带来的差异，包括了族源、血缘、地域和文化制度的差异。但是，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要凸显的是华夏“礼制”、“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等文化差异，以种族和血缘区分“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的华夷族群认同并不是春秋时期“礼别华夷”的主要文化价值取向。两周时期又形成了“夏，大也”^④以华夏文化为大为美的价值取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⑤这种以周朝礼乐文化为华夏中心和华夏正统的认同标准和文化价值取向，对

① 《论语·宪问》，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12页。

② 《左传·定公十五年》，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同上，第248页。

③ 《礼记·王制》，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同上，第1338页。

④ 《礼记·乐记》，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同上，第1534页。

⑤ 《礼记·乐记》，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同上，第1534页。

中国历朝各代的华夷关系和华夏认同具有重大影响。

西周崛起之前，华夷界限并不像后来那样泾渭分明。当代考古发现的“多如繁星”的华夏区域文化，也证明夏商周三代之前文化中心多元化的格局。夏、商朝建立，父家长制的各部族文化开始汇聚成初步的华夏文化中心。夏朝时期华、夷、戎、蛮多族共居于“九州”之内，实行九州五服贡赋制度。^①此时的华、夷、戎、狄、蛮只是通过“五服”制度体现各自地域和族群血缘谱系的差异，并没有着意凸显华夷文化的尊卑高低，均是以上承“天命”标榜本族群、王朝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如“有夏服天命”、“有殷受天命”^②、“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③。此处“天命”中的“天”，指具有神格的最高主宰皇天上帝，“命”则指上天的意志命令。人的一切活动，从居处、祭祀到征伐，均听从天之所命。“王”是受命于“天”对“天下”实施统治的统治者。商王以上承天命自任，“先王有服，恪谨天命”^④。《诗经·商颂》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⑤，使商人具有了受命于天的合法性。盘庚迁殷，乃“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⑥商汤伐夏桀被认为是“有夏多罪，天命殛之”^⑦。周人取殷而代之，同样是“天惟丧殷”^⑧、“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⑨。周朝与夏、商不同之处，除了尊崇“天命”外，还强调“天命有德”^⑩、“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⑪的德政和礼制。“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⑫周公通过礼制把人文伦理性格赋予“天”，成为周以后春秋时期儒家“礼制”规定下“天命”观的确定内涵。《礼记·表记》以“夏道尊命”、

① 《尚书·禹贡》，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3页。

② 《尚书·周书·召诰》，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同上，第213页。

③ 郭沫若《奴隶时代》卷首图版四《大孟鼎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页。

④ 《尚书·商书·盘庚上》，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8页。

⑤ 《诗·商颂·玄鸟》，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同上，第622页。

⑥ 《尚书·商书·盘庚上》，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同上，第168页。

⑦ 《尚书·商书·汤誓》，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同上，第160页。

⑧ 《尚书·周书·大诰》，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同上，第200页。

⑨ 《尚书·周书·康诰》，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同上，第203页。

⑩ 《尚书·虞书·皋陶谟》，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同上，第139页。

⑪ 《尚书·周书·召诰》，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同上，第213页。

⑫ 《礼记·明堂位》，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同上，第1489页。

“殷人尊神”、“周人尊礼”^①勾勒出了三代“天命”内涵从敬上帝到拜鬼神，直至周王朝尊人崇德的礼制内涵的发展线索。

“周人尊礼”，是周朝确立华夏文化中心和华夏正统的关键之举。“礼”，是周朝建立的包括分封制、世袭制、等级制在内的一系列礼制，是华夏文化、制度成熟的标志。“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②“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③“礼，上下之纪也，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④形成了“周天下”“四夷宾服”的华夷统治格局。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⑤，形成以礼乐法度相标榜的华夏文化中心。“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⑥通过以周礼为中心的礼乐制度文化，分辨华夷尊卑高低、文明与落后，形成春秋时期“礼别华夷”^⑦的重要内涵。

这种以华夏为中心的文化价值取向，使中原华夏各诸侯国开始鄙视、排斥曾经和他们同处周边的四夷文化。赵武灵王采用胡服骑射的夷狄文化，被国人批评为：“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叛学者，离中国。”^⑧“夷夏大妨”和华夏中心、华夏正统的优越感由此可见一斑。

首先提出“华夷之辨”的尽管是春秋时期的管仲、齐桓公，但是确立“礼别华夷”的“夷夏大妨”和“华夏中心”、“华夏正统”价值取向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是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学说。如刘师培先生所云：“自孔子言‘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而华夷之防，百世垂为定则。”^⑨

① 《礼记·表记》，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41页。

② 《礼记·曲礼上》，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同上，第1231页。

③ 《礼记·曲礼上》，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同上，第1231页。

④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同上，第2108页。

⑤ 《诗·小雅·北山》，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同上，第463页。

⑥ 〔汉〕刘向《战国策》卷一九《赵策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

⑦ 陈玉屏《对先秦儒家“礼别华夷”的解读》，《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00页。

⑧ 〔汉〕刘向《战国策》卷一九《赵策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

⑨ 《刘师培全集》第二册《攘书·夷裔篇》，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华夷之辨”，在文化礼制上界定华夏、夷狄的目的，除了确立华夏中心和华夏正统认同模式，旨在维系“内诸夏而外夷狄”^①的统治格局，实施王者“不与夷狄之主中国”^②的“华夷大防”——也即严禁夷狄对华夏中心和华夏正统的占有、僭越及对中原诸侯事务的参与。僭越者则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被讨伐。

“内诸夏而外夷狄”，原意是将“五方之民”限定在各自生活的区域内，以保证“礼”在华夏族区域内正常运行，不因夷狄的内徙和夷狄文化影响而遭到干扰或破坏，凸显夷夏内外之辨，维护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天下中国中心秩序的目的。但是，延至战国，随着周天子正统地位的淡化，楚、吴、越、秦等四夷不仅相继逐鹿中原，而且僭越称王，争夺华夏正统。受华夏正统和华夏中心认同模式的深刻影响，四夷“虽是争夺天子或霸主地位，却又是对华夏文化的归属。其文化上的价值选择是：站到华夏正统文化的旗帜之下，进而成为它的合法主宰。是归属它，而不是毁灭它。”^③这种华夏正统认同模式，影响极其深远。两千多年来，异姓王朝或夷狄——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无一不是沿用这一认同模式，以“天命”论争夺华夏中原的合法统治权利，以华夏正统自居作为获得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关键。

与以华夏正统为中心的“华夷之辨”和“夷夏大防”相辅相成的，是孔、孟倡导的“用夏变夷”^④。孔子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夷夏之防”^⑤，虽然强调华夷族群的差异，同时又认为这些文化差异是可以改变的。孔子主张通过“修文德”以“来远人”的方法实现“用夏变夷”，而反对武力征服。“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⑥“近者说，远者来。”^⑦“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

① 《左传·成公十五年》，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97页。

②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同上，第2327页。

③ 秦永洲《春秋战国的华夷之辨与华夏正统之争》，《山东师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第68页。

④ 《孟子·滕文公上》：“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06页。

⑤ 《左传·定公十五年》，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同上，第248页。

⑥ 《论语·季氏》，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同上，第2512页。

⑦ 《论语·子路》，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同上，第2507页。

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① 孔子主张通过华夏国家内部的“修文德”、“好礼”、“好义”、“好信”，来吸引夷狄之人的主动归附，用华夏礼义文明来感染他们，教化他们，使他们成为华夏族的一员。原属“化外之民”的四夷，如果接受了华夏文化，实行华夏的礼乐制度，他们就成为“化内之民”，被华夏族群认同。可见，使夷狄华夏化——接受华夏文化，特别是实行礼乐制度而被诸夏族群认同，是“用夏变夷”的重要标志。

孟子直接提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②。只能“用夏变夷”，不能变于夷，也即只有华夏文化影响夷狄，不能让夷狄文化影响华夏。并且用上乔木、入幽谷比喻华、夷文明的高下区别，强调华夏文化的高文明程度和优越性，凸显华夏中心的文化价值取向。

源自春秋、战国的“华夷之辨”、“用夏变夷”华夏中心和华夏正统认同模式，成为秦、汉、唐以来华夏民族认同建构的主要方式和传统核心价值体系。影响着秦汉以降，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宋、辽、西夏、金、元、清等两千多年华夷族群的认同模式和华夏民族认同取向。

二 “华夷同源共祖”多族大一统认同，是秦汉“大一统”背景下华夏民族认同建构的新模式

战国以降，楚、吴、越、秦等参与中原争霸的夷狄族群，已与齐、晋等国同称为诸夏，造就了华夷同居天下、共处海内的历史事实。打破了以往唯有周天子才能统治天下的华夏正统，打破了“不予夷狄主中国”的“华夏中心”主义。适应这一历史潮流，孟子进一步论证夷夏族群认同转换的关键是“得志行乎中国”——实行礼乐仁治：“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③ 而孟子的“得志行乎中国”——实行礼乐仁治的另一个重要内涵是实行“定于一”^④ 的大一统。以孔子《春秋》为代表的

① 《论语·子路》，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06页。

② 《孟子·滕文公上》，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同上，第2706页。

③ 《孟子·离娄下》，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同上，第2725页。

④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见〔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同上，第2670页。